

西南非洲

[南非]鲁思·弗斯特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K422/1

西南非洲

〔南非〕鲁思·弗斯特 著

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师生集体翻译

山东大学外文系翻译组校订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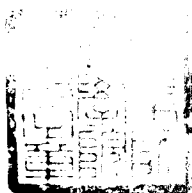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08098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8年·济南



708098

РУТ ФЕРСТ
ЮГО—ЗАПАДНАЯ АФРИКА
Историко-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Е.Д. Михайл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ГРЕСС”
МОСКВА 1965

Ruth First
SOUTH WEST AFRICA
Penguin Books, 1963

根据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5年俄译本翻译,根据英国企鹅书店1963年英文原版校订。

内 部 读 物

西 南 非 洲

〔南非〕鲁思·弗斯特 著
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师生集体翻译
山东大学外文系翻译组校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99·53 定价1.35元

出 版 说 明

《西南非洲》是南非女作家鲁思·弗斯特介绍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历史和近况的著作，初版于1963年，为罗纳德·塞格尔主编的《企鹅非洲丛书》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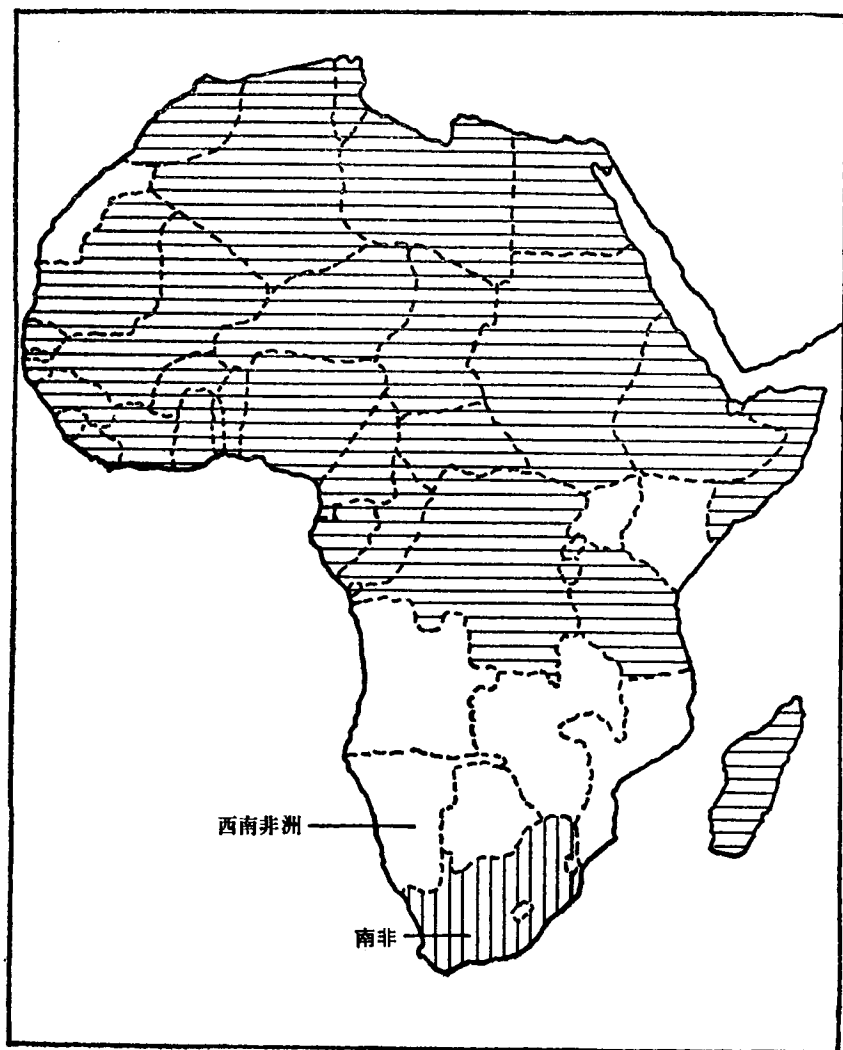
西南非洲各族人民先后遭受英、荷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压迫，十九世纪末，沦为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控制的国际联盟，“委任”南非统治西南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南非洲各族人民仍然在南非反动当局种族隔离的枷锁下呻吟。鲁思·弗斯特对西南非洲各族人民深表同情。

本书对南非反动政权和种族隔离制作了较为广泛的揭露，对我们了解西南非洲的过去和现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对于书中作者的资产阶级观点，阅读时请注意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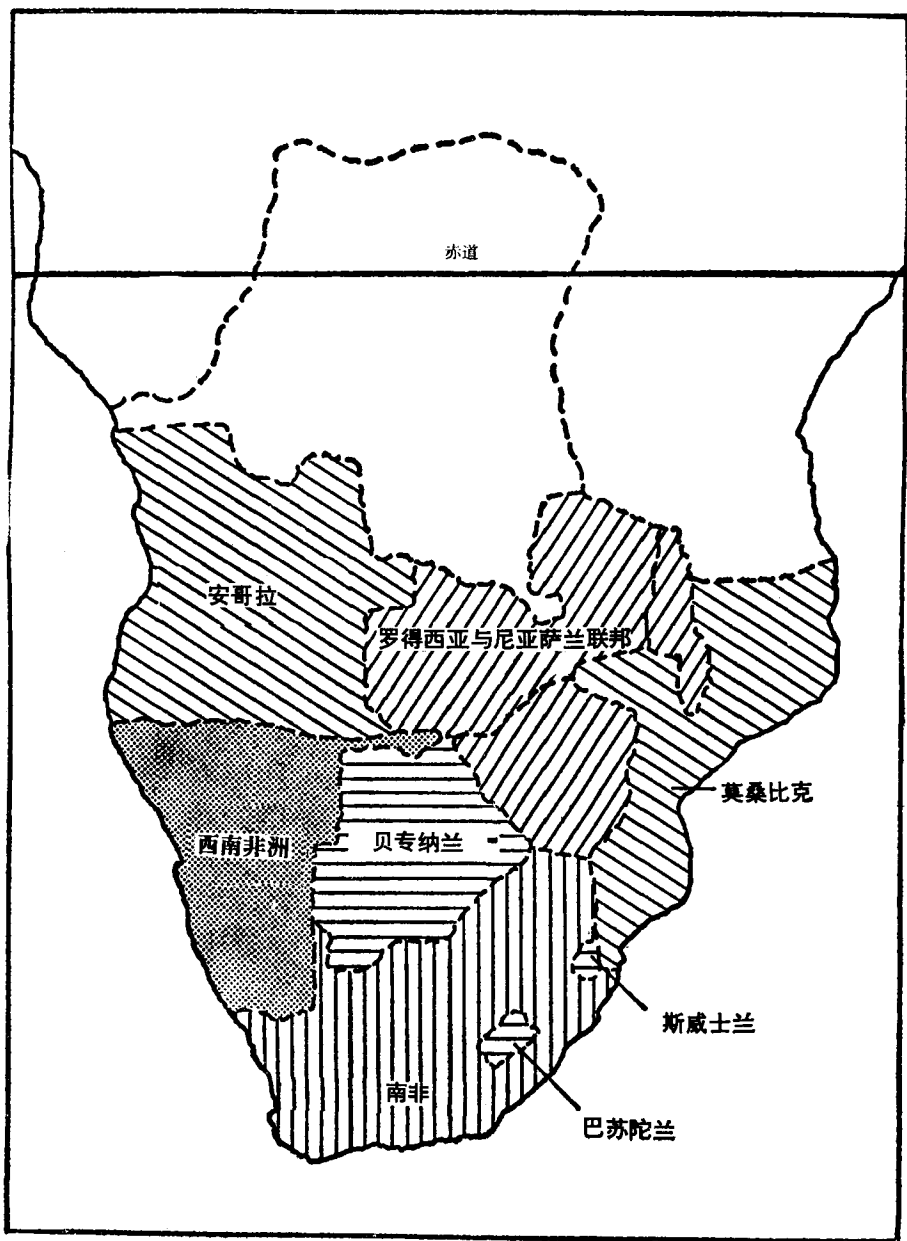
本书由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71级工农兵

学员和教师，根据1965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的Е·П·米海洛夫所译的俄译本译出，由山东大学外文系翻译组，根据英国企鹅书店1963年初版的英文原版书校订。

1976年12月



非洲独立国家(空白处为未独立国家)



西南非洲和它的邻邦

难道我们竟会在绵绵无尽的关押下降生、生活，直到闭上眼睛吗？因为我们的酋长们为了人民、民族和土地而共同战斗，我们就是应该受到诅咒的一代人吗？

——戴维·维特布依酋长
给联合国第四委员会
的一份请愿书

引 言

11

冲突的梗概情况

温得和克主管档案的官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道：“你到这里来究竟想干什么？”我回答说：“搜集材料写一本书。”他以挑衅口气对我说，他可以禁止我这样作。于是我们争论了起来。他拿出档案法来给我看。后来他作了让步，我可以在那里工作，但要由他来决定我不能看哪些材料。大批报告摆在桌子上，他把1946年以后的全部材料都收了回去。

就在这一年，南非拒绝了联合国组织把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之下的要求；从那时起，南非一直蔑视这个国际组织。西南非洲是南非的产业：闲人莫入，违者严办。

我动身去西南非洲的前一周，据报纸报道，在西南非洲边境各段集结了军队，以阻止似将来临的联合国任何入侵。（联合国西南非洲特别委

员会曾要求进入该领土，以便亲自考察那里的情况。）我不是什么入侵力量，只不过是一位决心要搜集有关西南非洲局势的事实和看法的记者而已。但是我很清楚，在西南非洲向人们提出问题要求回答是不受欢迎的；访问那些向联合国递交过请愿书的人，在官方看来，无异于为搞颠覆活动作准备，而我又有过一段与南非大会运动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政治经历。^①我预先采取措施，提防警察下令不准我入境，或者对我进行监视并且把跟我接谈的人吓跑，因此我尽可能绕道而行。我这样作，看来是有远见的。

列车在贫瘠、多石而遭受旱灾的南方吃力地爬行。车厢里有四个人：一位地方助理法官、一位警官、一位警察和一位医生，他们要到首府去为审讯一起杀人案作证。他们在车上喝着白兰地酒借以消磨时间。那位警官很健谈。1961年他曾在奥万博兰值勤六个月，那正是安哥拉骚乱处于高潮的时期。他主动告诉我们：“我们用机 枪 扫

^① 南非大会运动，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领导的反抗白人统治的政治运动。——译者注

射一些村庄，搜捕煽动分子。”

安哥拉和西南非洲的边界把许多家庭、村庄和部落割成两半。若干世纪以来，奥万博人一直是由一个国家跨入另一个国家的，而现在他们仍然¹²这样做。但是现在一个人是否有权住在西南非洲或者住在安哥拉，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家庭关系和出生于那个村庄，而取决于他是由这个或那个政府发给通行证或许可证的。警官说：“我们在奥万博兰捉住一个确实是从安哥拉那边跑过来的煽动分子，就把他交给葡萄牙人。”他说，葡萄牙人有自己对付这些捣乱分子的办法，那就是把他们装上一架飞机，然后把他们投进大海。我想必是感到厌恶而皱了一下鼻子。那警官却毫不含糊地说：“但是他们不是人。”

我没有办法查对警官讲的那件事是否真实，但是我感到他的态度却最能说明这件事是真的。

“他们不一样。”非洲人跟白人不同，这就是种族隔离问题的实质。既然不是一样的人，那他们就不能指望享受同等待遇。

种族隔离不仅仅表现为西蒙·利格里手里拿着鞭子，在温得和克大街上高视阔步。种族隔离

也不是野蛮残暴的行径层出不穷，到处可见。它的影响是更为险恶的。

国民党的理论家和代言人的论点已经改变了。他们不再公开宣扬，非洲人属于劣等种族，因而不能让他们和白种人讲平等。许多国民党人嘴上也会不太舒服地说一些客气话，但是坚持说“班图”文化是一种珍贵的文化，必须使它有充分机会得到发展壮大，现在这样说倒被认为是政治上讲究礼貌。因此迫切需要单独划出一些地区，让非洲人能在那里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得到发展并从今以后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不管是由于“非洲人是劣等种族”（这是那位警官所确认的说法），还是由于“他们跟¹³白人不一样”（对外输出的说法）而他们必须在白人居住区以外“发展”，这种政策导致了非洲人和白人的分离。它把非洲人驱入荒野，结果制造出来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西南非洲——一个享有特权，而另一个则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而且两个西南非洲永远处于无休止的对立之中。这种政策使得任何联合两个西南非洲的尝试都被指责为叛国行为。

只有四整天我是在沒有受到政治警察监视的情况下渡过的。在这四天里我试图接触西南非洲。后来，突然惊动了特别局（当地对政治警察的称呼）的人。他们发现城里来了个陌生人，她跟非洲人交谈，向他们提出问题，记笔记，坐着赫雷罗议会议员显眼的美制橙红色小汽车四处活动，还到档案馆要求查阅官方报告。

这个警察国家除了在紧急时期以外，其日常活动也并不是喧嚣一时，有声有色的，有时还可能是松弛的，甚至是邋邋遢遢的。我在第一个周末，徒步去赴约会的时候，一辆警备车在路上超过了我，警备车上值勤的侦探穿着短裤和橄榄球运动员穿的袜子，象孩子一样笑脸相迎。开始时值勤的只有两个人，后来有四个人，甚至增加到五、六个人。他们两人一伙，在我身后六、七步沿着人行道或者在街的对面走着，要不就坐在露天咖啡馆里我身旁的一张桌子旁边。这时他们还不时在半夜里砰砰地敲我的门。恰好相反，比较聪明的侦探脸上甚至露出一种不大舒服的表情，因为事情很清楚，跟市议会的白人议员、赫雷罗人酋长、商人和行政人员交谈，跟他们一起在大

街上漫步或者去参观古迹，这在一个采访新闻的记者来说可以说是日常工作。

但是，对我的监视始终没有放松：他们跟踪着我到洗衣店和皮鞋店去，在公用电话间旁边躲躲闪闪；在我走过的街道两头和旅馆的每一个进出口都有人巡逻；侦探们跟踪我到飞机场去；我到邮局去买邮票，吃早饭的时候也被人盯梢。他们访问那些跟我见过面的人：“她向你打听什么？”

大多数白人都很有礼貌，都不愿谈我被追踪这件事。我仍然可以接近他们，但是他们却有所防范，而不肯多说话。

14 非洲人急于要谈话。街上的旁观者对我微笑使眼色表示，如果特别局的人在后面跟着我，他们是站在我一边的。

过了不久，追踪就达到了它的部分目的。开始时还可以用来跟非洲人晤谈的房屋不能再用了，房主人虽然表示遗憾，却坚决要收回房子；官员们的嘴闭得比蛤蜊还紧（尽管在这个国家沉默是官员们的第二天性），非洲人来跟我谈话，回头总看到一些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一位老人

把一张条子偷偷地送到我下榻的旅馆，上面写道：“我知道，我的话在报纸上一发表，我就要逃亡了。”

采访在街道拐角处、树荫下、汽车里和拥挤的商店里进行。有几次访问不得不取消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过路人看见一个白人和一个非洲人交谈，总是投以怀疑的眼光，恐惧迫使不同肤色的人立即中断他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脆弱的联系。

白人当然也和非洲人接触，但这种接触仅限于行政长官和头人，警察和罪犯，或者主仆之间的交往。1962年，在温得和克有三个白人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时跟非洲人会面，谈论西南非洲的问题。西南非洲没有一个同时属于白人和非洲人的政治组织；那里从来没有一个白人和非洲人都可以发言的讲坛。

这并不是说两个西南非洲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除了十足的主仆关系以外，并不存在什么两个西南非洲的关系。在立法会议当议员的只有白人。白人垄断了辩论、投票选举、编制预算、管理、制订计划和作出决议的权利。西南非洲的一

切政策都由他们规定，这些政策都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当这些政策受到攻击，他们就感到自己受到了攻击。他们也象在白人统治的南非他们的前辈那里一样，对于批评感到特别敏感。

“让非洲人也得到一份吗？不过，他们还不配，还不具备条件呀，”这就是白人的回答。

15 根据白人的观点，情况似乎是这样。在白人们看来，非洲人是文盲，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受过训练。但是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不是非洲人的教育没人被照管，而是非洲人不堪教育。

白人在当地看到的非洲人，无非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牧羊人，他的全部财产也只有几头骨瘦如柴的山羊。而白人认为这恰好能证明，非洲人缺乏经营农场的起码知识；却不认为这是由于人口过剩、缺乏土地、缺乏资金和各种农业救济的结果。城市里，在白人周围的非洲人，干的都是粗活，他们既没有技术也没有受过训练。非洲人是劣等种族，难道还需要找什么别的证据吗？

在白人看来，非洲人无非是一些没有理想、无精打采、一盘散沙的群氓，由于长期不和而分崩离析。白人对于非洲人的组织实际上是一无所

知，他们更不了解他们的领袖。受到法律承认并且得到习惯势力支持的白人至上主义，使得白人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他们对于白人跟黑人平等感到心安理得。为什么不平等也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说非洲人落后和非洲人居住的地区也落后。但是要有所进步必须花费很多钱，而西南非洲的白人却把几乎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自己身上。

政府的种族政策，跟这种政策的结果一样，都是残酷而狡猾的，但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从这一政策中获得好处的人都是残酷而狡猾的。只要你不谈论政治（而这意味着不谈“土著居民问题”），他们是直爽、好客而颇有风趣的。

令人不解的是非洲人竟看不清楚西南非洲的白人很容易就能看清楚的一件事。白人比非洲人富，而且受过较好的教育，简言之，就是他们比非洲人优越，他们最会判断什么对国家，对非洲人好处；白人也远比非洲人自己更有能力判断非洲人要的是什么，要等多久才能得到。白人的西南非洲被自私自利也被恐惧蒙住了眼睛。

他们害怕非洲人会把“白人陷在非洲人的沼